

导 论

中国文明面临的挑战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乘坐炮舰，手持圣经，全面侵入中国。八国联军一把火，不只是烧毁了古老帝国首都的圆明园，更烧毁了那个一向自视为“天之骄子”的帝国文明的骄傲，整个民族的沉稳睡梦被扰乱了。在以枪炮为代表的科技力量和圣经为代表的文化冲击下，有的人惊恐慌乱，手足失措；有些人祭起祖宗先世的旗帜，顽固反对一切外来的新事物；有些人走出国门，向这个远比印度佛教更有魅力的文明学习；少数的民族精英开始了思考中国文明命运的漫长历程。一百多年来，探索民族命运的旅程，染满了我们优秀儿女的鲜血，这些鲜血的代价究竟如何呢？

早在一千年前，印度文明曾经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过冲击。不少中外学者认定宋明文化是从根本上更新了的中华文明，文学与绘画的创造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种论点很难令人认同，因为印度文明没有能引起固有中国文明根基的变革，没有带给中国人真正巨大的活力与创造力，没有探索出走向未来的有效途径。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民族才在西方文明挑战下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19 世纪后期，梁启超和李鸿章同时意识到中国面临三千年历史的大变异，他们力图学习外来文明以补自己之不足，力求自强

自立于当世。梁启超全面猛烈抨击保守派拒绝新事物的立场，特别是尖锐批评了保守派以防范西方文明弊端为借口而阻碍改革的“防弊”思想。他的“因噎而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的观点，充满进取精神，至今仍闪射着智者的光辉。

很长时期，人们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是君主制。为推翻君主专制和变相君主专制的斗争牺牲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政治革新的历史进程至今还在继续，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仍然是我们面对的艰巨任务。与政治变革同时，人们理解到发展经济是走向现代文明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发展现代经济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逐渐强盛、繁荣的伟大中国出现在我们和全世界面前。

中国人为自己民族开始复兴欢欣鼓舞，但世界上也有不少人开始为中国的崛起而忧心忡忡。亨廷顿写了论世界文明冲突的书，极力强调了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冲突的不可避免——特别是和中国文明的冲突，表示了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力量的担忧。可是所谓中国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仅是指种族学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吗？是指中国经济力量强大后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威胁吗？是指中国和西方不一致的政治体制可能引起的摩擦吗？

“中国文明”和“中西文明冲突”对中国人自己也是不太清楚的概念。我们不是正在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活动方式甚至政治、法律运作形式吗？欧美一些学者谈论的与中国文明冲突究竟有什么内涵呢？我们不是很担心“中国全盘西化”吗？难道西方人也会担心欧美“中化”？在中国广大国土上，西方式的企业和市场运作，从西方学习来的科学技术、政治法律形式乃至生活样式，已经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属于中国自己的文明还剩下些什么呢？

如果说中国的未来目标只是建设成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只

是要人民的生活水平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虽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虽然也许要一百年、两百年的时间，但这毕竟是会达到的，一二百年对历史而言不算太长。如果中国人到头来没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特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还能有多少意义？提出上述问题，绝不是要低估发展经济伟大历史性任务的价值与艰巨性，更不是想转移人们对发展现代经济、政治的注意，而是想提出一个对民族未来命运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把经济、政治现代化进程同时看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再创造过程，作为一个民族生命实体，很可能在前进中丧失自己。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时，他担心的是中国文明对西方的威胁；可我们自己面临的挑战却是能不能在历史发展中更新、创造自己的中国文明。归根结底，这才是西方文明对中国提出的根本性挑战的实质！未来的中国文明只能是现代经济政治和中国精神文化的统一体，低估重组、改革、创造自己精神文化的意义，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顽固反对、敌视外来文明的力量崩溃后，近代史上出现了长期片面反对、否定传统文明的倾向。“五四”时提出“打倒孔家店”，说应该把线装书抛进厕坑三千年……作为时代需要，以大无畏态度清扫精神垃圾是可以理解的，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精神“呐喊”出中国的新生。可是事物常常走向人们意料不及的地步，到“文化大革命”，当人们把一切传统文化全部归入“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文化在表面上被全面否定与丑化的时候，旧文化中最阴暗、最腐朽的成分，却以狂风暴雨之势在事实上支配了我们民族的言行。事实无情地向人们宣告：那个似乎早已死亡的民族灵魂，仍然顽强地存在着。

中国文明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它不仅有应该反对的东西，也有应该继承、发扬与改造、创新的东西。

历史向人们呼唤重新认识与评价我们自己！

一位著名学者认为：

中国文化是……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假如这个文化动源的主位性保持不住……即使现代化了，此中亦无中国文化，亦只不过是“殖民地”的身份。^①

也许这些话有点偏激，但作为正处于复兴时期的中国而言，重新认识、评价自己是绝对必要的。全部世界史证明：所有古老文明中，中国文明是惟一具有强大生命发展与延续能力的文明。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挑战远未结束，我们应战的结果不应该是丧失自己，而只能是再创辉煌。

民族文明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在世界史研究中有许多理论和方法，其中有两种特别重要。

一种是把人类史看作不断上升的过程，从原始落后社会到中世纪到近代再到现代，这种理论可以有多种形式，但都认为历史是一直指向上升的、更高级阶段的过程。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但这种理论的弱点也很明显。除了人类在进步的同时失去许多美好的东西外，它不能解释许多民族显然存在的兴衰现象。谁能否认，中国在战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繁荣，包括它的精神自由与解放气氛，至今也是我们的典范。谁能否认，不可一世的西方文明正面临衰落，19世纪的光辉灿烂的哲学、文学一去不复返了，一种充满进取精神的文明表现出无力对付各种犯罪、道德沦丧现象和现代科技对环境与人类自身的挑战，

^① 牟宗三：《时代与感受》，7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人的本质力量在弱化。不断上升的理论似乎带有宗教的烙印，把彼岸世界引入现世，似乎是人类会一步步走向天堂的学说，未必能令人完全信服。

另一种理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各民族的发展史上，认为世界史的对象主要是各个民族的发展史，而民族的历史有着明显的生命特征。斯宾格勒系统提出了民族文明生命性的学说，指出每个民族的文明都有发生、成长、繁荣和衰亡的现象。他说：“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深奥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中。”^①按这一理论，中国的战国时期和希腊的雅典时期、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处于历史的同一阶段；西方当前的文明衰落相当于中国秦以后的时期。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上述生物生命式的文明理论，提出了他的历史哲学，但仍然把民族文明视为世界史的主要对象，是一种发生、生长、衰老、死亡的循环过程，只不过强调了外来挑战和人类自身创造的意义，并提出民族文明可以有第二代、第三代可能的理论。汤因比的理论在世界上影响巨大，可是，当他极端夸大佛教对中国的意义、把佛教视为中国唐代的内部统一教会并形成第二代中国文明时，当他把人类的未来寄托于宗教时，人们不免对这一类理论在理论上的弱点和运用时的困窘表示惋惜。

合理的历史哲学可以吸取以上两种历史哲学有价值的内涵。马克思早就警告过把他的历史哲学运用于具体历史过程的极端困难，这里每一步都需要创造性的劳动。精神文化一旦形成就有它自己的独立发展规律，并对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精神文化通过历史积淀进入人们的意识，对人们的思维与行动发生重要影响。

社会历史过程和自然规律并不完全一样。如果说社会历史发展也有规律可循，那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只可能是指一种大约的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1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趋势，而且并不排斥人的自为性。因为人类和自然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类有自为、创造的可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历史，甚至理解其中的一个小过程，都比研究自然现象复杂得多，都需要反复的创造性努力。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讲，民族文明史的研究都有重大价值。离开民族文明，我们根本不能理解过去与今天的许多重大事件。

为什么德国人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此起彼伏有过多农民战争，印度却没有？

为什么埃及帝王建造了尽力炫耀自己的巨大金字塔，中国帝王却建造极力遮掩自己的巨大的地下宫殿？

为什么高度发达的雅典城邦文明昙花一现，而中华帝国却一再复兴？

为什么雅典出土了那么多裸体雕塑，中国却出土了许多祭器食具？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罗斯的彼得改革能成功，中国的光绪维新却一败涂地？

为什么以色列人经数千年灭亡能够复国，其他民族不能做到？

为什么伊拉克敢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公然宣布吞并科威特（这只是萨达姆个人的原因吗）？

为什么欧洲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宗教纷争与战争，中国却会有红卫兵运动？

为了深入理解过去、展望未来，应该而且必须把对人类史的研究与对民族文明史的研究统一起来。黑格尔所说某一民族代表绝对精神固然是一种偏见，但民族文明史对人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中国正快速走向富强的今日，对自己民族文明的深入研究是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的时候了。

民族潜意识

对中国民族文化与心灵的探索存在许多肤浅的看法。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把个别的民族精神特点看成民族精神整体，导致不是对中国人的特色极度丑化就是极度美化。另一种流行的作法是主要从文物典籍、文章文化中去认识中国，似乎读遍“四库全书”就能够理解中国精神之所在；而这种精神正如代表它们的古籍一样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离开了当代的生活。

这类探索中国人心灵的途径无疑是表面的、肤浅的。

王船山有句名言：“害莫大于肤浅！”“五四”时提出把线装书抛进厕坑三千年，“文革”中红卫兵把许多文物与古迹当作旧文化的实体加以摧毁，都是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与做法。其实高喊打倒孔家店与肆意捣毁旧文物的人群，尽管动机不同，但谁的灵魂中没有一颗中国心？旧文化，传统精神，好也罢，坏也罢，都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民族精神特征并没有死去，我们无法同意把中国文化当作死文化来研究的观点。中国传统精神无时无处不在，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灵魂中。要真正理解中国文明的特点，理解中国人，就必须深入到人们心灵中去。

梁漱溟曾说：“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漫漫渐灭，今已不易得见……”^①梁先生的看法一方面是就中国精神的优秀表现来说，另一方面是就表现为理论体系的文章文化而言，特别是，他在实际上说的是创造力的衰微，这些言论可以理解。但有的人把这一观点普遍化了，一般地把中国文化视为古代的事物。这一倾向很值得商榷。如果中华民族精

见《梁漱溟全集》，三卷，130～13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神是“过去式”，那我们就无需花那么大的精力去研究了。可惜抱此种观点的学者为数众多。

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理论，是哲学与心理学的重大发现。不能因为这一学说片面夸大人的性本能就不承认其潜意识学说的价值。荣格在这一学说基础上提出了人类集体潜意识理论，指出人类有着某些共同的潜意识。各民族都创造了或多或少的神话，就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原型之一。人的表层意识像水面上露出的海底山峰的一角，其潜意识像山峰的庞大躯体则潜隐在水面之下。人类集体潜意识有如海底的海床，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人类的思维与行动。

在我们看来，每一民族也有着自己的民族潜意识。这是民族文化长期历史发展的精神积淀。古代的观念、习俗、精神和文化典籍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人们能够察觉的意识与一时未必能察觉的潜意识的总体，构成了民族的灵魂。只要留心，不难时时处处看到民族潜意识的显现。“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将惊心动魄于其相似之甚。”^①

举个小小的但极普遍的例子，中国人骂人就与其他民族很不相同。鲁迅说：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如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

① 鲁迅：《忽然想到》，见《鲁迅全集》三卷，17页。

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①

骂人骂其父母，是潜意识的典型表现。外国人就不能理解中国的“国骂”，德国与日本的翻译者曾为“他妈的……”之类话语伤透脑筋。其内涵实质是中国人内心不认可个人的独立性，个人人格从属于父母家庭。骂父母比骂本人更能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当然还有其他的潜意识渗透在里面。）一个表面微不足道的生活现象，其实隐含着异常深刻的民族潜意识内容。鲁迅研究国民性，实际上正是在开辟探索民族潜意识的道路，这是和其他执著于文章文化的学者大不相同的地方。

又如中国人的游戏多半比较文静：咏诗、联句、对对联、打灯谜、酒会、射覆、投壶、看戏、打麻将、下棋、蹲茶馆、听书、养小鸟、养金鱼、培植花卉、斗蟋蟀、斗鸡、耍龙舞狮子、赶庙会，甚至武侠小说中最高级的武功也以“内功”的形式显现……比之欧美的激烈运动如：赛马、高山滑雪、冲浪运动、登山冒险、拳击、斗牛……差异明显。这也反映了民族潜意识的不同。

中国人的烹调饮誉天下。一心想学得真谛的德国厨师来学习，手执量杯、跑表，要中国老师讲某种材料放多少克，某一道手续要多少秒，弄得中国老师哭笑不得。双方的思维方式不同，潜意识不同，一目了然。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不同民族间的真正理解是不可能的。这话未免绝对化。但不同民族间的确很难在心灵上真正互相理解，则是事实。这是因为彼此的民族潜意识不同（灵魂不同），对许多问题与现象必然产生不同的反应。

潜意识和显意识不是截然分开的，两者相互渗透，只是潜意

^① 鲁迅：《论“他妈的”》，见《鲁迅全集》，一卷，2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识隐藏在心灵更深处，对人们有着更强的支配力量。孔子和老子的许多观点已经以不同形态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人们的潜意识，而墨子的理论则不能这样说。

笔者把民族意识的基本构造称为民族文化基因。正如生物界有遗传基因一样，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化基因也能遗传，一代一代承袭下去。不同点在于前者是物质基因的遗传，后者是精神文化从人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发生影响的结果。前者是生物物质运动的自然过程，后者是文化沉积的社会生活过程。

不论是观察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不但要看他怎么说、怎么做，更要看他真正的行为动机。中国今天几乎天天处处都有表彰会，各种各样的表彰形式和奖品令人瞠目。这当然和古代中国的表彰活动有直接关联。问题在于：是什么潜意识形成对表彰的过分重视？研究民族心灵正是要从这些现象入手，从大量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去探索自己民族的灵魂。文物与文章只能作为参考与印证。

强调民族潜意识，把通过精神积淀至今仍处处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民族意识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本书不同于其他有关中国文明与中国文化论著的主要特色。把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作为活生生的生命实体对待，这种探索道路，与视中国文明为已死文明或古代文明的概念，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民族文化基因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过变化。但文化基因的结构比较顽强，要发生重大变化非常困难。中国的文化基因由于历史发展的长期停滞，呈现出老化的趋势。外来基因的冲击往往能形成基因变革的重大契机，这正是我们面临的严峻历史课题。

智慧爆炸

民族潜意识和文化基因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蒙昧时期。原始部落里已经孕育着文化基因的雏形，任何一个原始部落都有自己的文化心理特色，这已为大量的研究所证明。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一原始文化存在都能创造性地展开，能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文化特点并在政治经济上取得成就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们容易观察到这少数发展起来的文化无例外地都有过创造力爆发的伟大时期。海德格尔曾指出：“伟大的时代正因为它是伟大的，故而极少出现，即使出现，其持续过程也颇为短暂，恰如对每一个体的人而言至为紧要的只是一个片刻。”^①不妨把这一创造力在广大范围内迅猛展开的现象称为智慧爆炸。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产生过智慧爆炸，能产生智慧爆炸的情况是不多的。有些文明虽然有过智慧爆炸，但能量比较弱，没有能达到足够的强度，这一类爆炸形成的文明未能产生最光辉灿烂的文化，也没有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令人惊叹的繁荣。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就是其显著的例子。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纸草文献，远不能和希腊的大批举世闻名的学者与学术创造相比，也不能和中国光芒四射的战国文明相比。即令也有被称为世界奇迹的金字塔，也不能说明其文化和经济、政治发展达到了全面的高水平繁荣，埃及人并没有能留下能和金字塔比美的文化学术成果影响全世界。埃及文明在人类文明创造中领先，但一度产生不太强的智慧爆炸后就停滞不前，慢慢衰亡。现在除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古代埃及有所了解的人已经很少了。

见《海德格尔论尼采》，第五章，2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还有一类文明虽然产生过强度足够大的智慧爆炸，但由于种种内外原因，爆炸形成定向趋势，在某一方面智慧展开得淋漓尽致或是充满魅力，而在其他方面则平淡无奇。伊斯兰文明与印度文明是这一类文明的典型。伊斯兰文明在 6 世纪兴起，以令人震惊的速度爆炸式地向外扩张。伊斯兰人创造了惟一能代表“无限”的真神安拉，他们一手持剑一手持《可兰经》，其精神魅力与武力所向无敌，短短时期就在世界各地创建了大批伊斯兰国家，创造了人类史上的空前奇迹，其创造活力之旺盛令人惊异。可伊斯兰文明的内在文化创造与其外在强形很不相称，虽然在哲学、文学、天文学、数学诸方面也有不少成就，与其近旁的西方文明相比，无论科学、哲学、文艺的成就都难以企及。比之希腊、中国产生过的大批哲人圣贤，其弱点是显然的。印度文明虽然在公元前 5 世纪前后产生过智慧爆炸，出现了大批饱含智慧、最深入地思考了人生意义的哲学家与佛教徒，但这一创造远离世俗人生的定向如此明确，以致于一个伟大民族连自己的历史也不屑一顾。印度文明有着其他文明没有的巨大优点，可其丰富性完全不能与希腊文明和中国的战国文明相比，也是不争的事实。

原始大爆炸形成了我们的宇宙，这一学说大体已经被科学界接受。自然界大爆炸以前的情况和原因没有人能说出什么。人类文明的展开与此竟然惊人地类似。世界上最出色的文明也是由智慧大爆炸产生的。

在雅典伯利克利时期前后，希腊在一两百年历史中，突然出现了巨大的智慧浪潮，一大批被后人称为巨人的伟大人物涌现出来。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比达哥拉斯、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希罗多德、提摩西斯尼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多芬、梭伦……正如恩格斯指出过的，希腊人几乎在一切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它的智慧触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

与此几乎同时，在东方的中国，也出现了智慧的大突破、大爆炸。在战国时期前后一两百年间，中华民族的智慧创造胜过以后的几千年。孔子、老子、墨子、荀子、孟子、庄子、韩非子、孙子、邹子、慎子、杨朱、公孙龙、子产、管仲、李悝、商鞅、蔺相如、屈原、扁鹊……一时间，群星璀璨，巨人们创造了留芳千古的中华文明。此后，尽管有“汉唐盛世”之说，也难免“脏唐臭汉”之讥。战国时代的惊人智慧创造活力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方，中世纪后期发生了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为名的智慧爆炸，在反对教会专横、呼唤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声中，一大批伟大人物诞生了。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牛顿、莱布尼兹、笛卡尔、培根、但丁、莎士比亚、薄伽丘、斯宾诺莎、穆勒、洛克、霍布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歌德……这是人类近代史上惟一可以和古希腊文明与古中国战国文明比美、并在规模上与影响上超过前两者的文明大创造。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逐步成为影响与支配世界发展的洪流。

希腊的雅典文明、中国的战国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史上三个发生过真正巨大智慧爆炸的文明，也就是说，是人类创造活力向四面八方最充分展开了的文明。这三个文明的智慧，触及人类可能触及的一切领域，却又具有最鲜明的个性。世界上，这三个文明的个性特点是如此独特，性格是如此丰满，以至别的文明不可能不受他们巨大魅力的影响而发生变革。

希腊文明和西方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汤因比把西方文明视为希腊文明的第二代，当然有他的道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此进一步加以讨论。由于产生过自己的智慧大爆炸及其他许多原因，还是把西方文明视为另一个独特的文明更能令人信服。尽管如此，毕竟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近亲关系，其性格也有类似之处，而且雅典城邦国家与希腊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和当代西方文明对立着的惟一高度发展了的文明，如今只有中国文明。中

国不像希腊，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保存下来。问题在于这个文明虽然有自己的巨大宝藏，却已经早就衰老了，她的创造能力似乎已经枯竭。

文明的生物生命理论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的宿命论。民族文明固然有生命的某些特点，但一代一代人毕竟有生命的活力与创造力。在智慧大爆炸之后，虽然民族文化基因已经成型，难有根本的变动，但民族创造潜在的力量仍然不断表现出来。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极强音表达了一代代有活力的人的创造追求。宋代的理学和禅宗的创造，就是一次不算小的智慧突破，它表明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仍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仍能闪射光辉。“五四”前后也曾出现过某种程度的“群星璀璨”局面，产生过一次一定强度的智慧爆炸序曲。虽然不能和战国时期相比，也是相当可观的，都是在外来文明刺激、冲击、挑战的条件下发生。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基因已经定型的文明，在外来激素作用下，产生新的智慧爆炸和重大基因变革是完全可能的。

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我们不能不以一定形式接受它，因为它的确含有许多合理的因素，有着无法抗拒的巨大魅力。如果我们不能自己有真正出色的巨大的创造，最终只能走被同化的路。被强力迫使也好，半推半就也好，一厢情愿也好，“无出息”的人只能被同化。但也还有另外的路，那就是在接受别人全部合理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民族文化再创造，创造性地改组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真正地做到“推陈出新”，创造出继承战国文明优秀精神遗产的新文明。

关于“扬弃”

哲学上的否定往往有着“扬弃”的意思。“扬弃”是说吸取其

优秀成分而摒弃其有害成分，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般而言，对一个有独立品格或独特色彩的对象，特别是对有生命内涵的对象，这种观点常常无法兑现。以普通的、最小的事而言，譬如吃羊肉，虽然可以把某些次要成分抛弃，“弃其糟粕”，但就余下的精华而言，仍然有着羊膻味。这里，作为羊肉特点的某种腥味，既是其优点，是精华，是许多人爱吃羊肉的原因；又是其缺点，是糟粕，是不少人认为不能忍受的东西。一个对象，其特色既是精华又是糟粕，二者统一不可分割。

所谓优点、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主观感受，是一种主观评价。我们认为忠实的狗很好，野蛮残忍的狼不好，可狼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对伴侣很忠实，很勇敢。杰克伦敦就写过得到广泛赞扬的歌颂狼的野性的小说。世界各民族的价值标准，不少地方是不同乃至相反的。

这样说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完全正确，从人类整体生存、发展、求取进步的角度看，总有一些东西是全人类一致的，如果不是绝对化的态度，美好与丑恶的区别还是应该肯定。即令如此，我们在对待像民族精神这样的对象时，仍然无法清楚地把精华与糟粕分开来。正如一个人，稳重者虽不孟浪，却常常弱于冒险精神；冲动者不拖沓，却又容易失之肤浅。联合国一位领导人在周恩来体现的中国文明泱泱风度面前，深深感愧似乎自己是原始人；而一些外国旅游者说在中国一星期听到的慌话比在英国一年听到的还多。这是对同一文明的不同感受。

正当我们大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学习科学理性与逻辑思维的时候，深为西方文明前途忧虑的海德格尔却指出逻辑与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两大祸根。天才的数理逻辑哲学家哥德尔发现的哥德尔定律，揭示出理性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悖论结构，表明最受人们尊重的西方科学与理性也有其内在矛盾，也是精华与糟粕的统一体。丹尼尔·贝尔则在他写的《资本主义矛

盾》一书中指出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创造中彼此间的冲突，并进而指出在文化领域，“宗教冲力”与“科技冲力”的不协调已经形成危机态势。

对人类而言，因为一切都是从人自身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而人类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对同一对象的评价会有不同观点很自然。

同一精神与文化对象，从这个角度看可以非常美好，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非常丑陋。强调天赋人权、个人自由的西方精神，产生了最伟大、最辉煌的创造，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命方式；但同一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也容易使人的欲望失去控制而走向兽化。强调天赋人责、个人价值在于对社会家庭尽义务的中国精神，产生过浩浩荡荡的英烈队伍，令全世界惊叹；但同一精神也造就了大批奴才，听任奴化精神肆意阉割创造性。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能够明确分开，那么，文化与精神改造就变得很容易、很简单了。问题的困难与复杂正在于二者内在统一着，如果我们不愿失去自己，就只能在烈火煎熬的大创造中重新熔铸自己的文化基因。

黑格尔说，历史的起点在东方，终点在欧洲。果真如此，中国文明只有被同化与消失的命运，最多在统一的人类文明中保留一些枝节性的风俗特色。我们不相信这种宿命哲学，不相信这种“规律性”。人类文明有自为性，中国也一样，中国文明由于其极端鲜明而饱满的个性，应该能在创造力的再爆发中获得新生——不只在生产力上，也在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上。

一些人把文明改造看得太简单。流行着一种观点：似乎新加坡似的成就与格局代表着今天的东方文明。有的人干脆说市场经济加新权威主义再加上点家庭伦理就是东方文明的新形式。文明不是简单的大杂烩或拼盘，而是活生生的生命现象。新加坡的成就固然了不起，可要说它已经创造了一种文化基因或改组了中国

文化基因则未免言过其实。对新加坡与许多亚洲国家而言，吸收、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还在继续，还远没有完成，而创造自己新文化的过程才开始。真正能担负起改造、创新中华文明任务的只会是在东亚大陆有着广大影响的中国自己。仅仅有经济奇迹远远不够，香港已经是世界性的经济、金融中心，但香港在精神文化的成就上却是很弱的，是微不足道的。全部困难就在于不是拿来一些、保留一些就可以实现民族的复兴，而是要求实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构性改造，要求改组已有的基因，产生新的文明构造。

文化危机：回顾与展望

在经济全面发展中，在大胆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理想与道德似乎在沉沦。传统的道德也奄奄一息。“百分之百为公”、“公私水火不相容”的极端倾向受到报复，加上种种主客观原因，大肆挥霍公家财富，贪污、腐化等危机性现象遍及全社会……可一贯乐观的中国人对这一切并不着急，人们为电视机、电冰箱、电脑的普及欢欣鼓舞，充满乐观地向前走！

20世纪初，梁启超一方面指出：“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者……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①（应该说他说的“改弦更张之道”至今也还正在探索中）；一方面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橘黄……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复而剥、由奴而主、由

^①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载 1986 年 9 月《时务报》，第 3 册。